

世界人口

九十年代以来国际人口迁移的新浪潮

张善余

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急剧变动引发了国际人口迁移的新浪潮

进入90年代虽然还只有短短三年,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却已发生惊人的剧变。美苏对抗的两极格局终结,多极化趋势加强,国际关系出现了战后从未见过的大变动和大改组。力量对比的失衡,激化了许多原先由“冷战”掩盖的矛盾,民族、宗教和地区冲突狼烟四起,使人目不暇接。与此同时,国际经济环境不断恶化,南北差距日渐扩大,数以千万计的人口陷入了贫穷和动乱的绝望深渊。

在上述背景下,世界范围内涌起了国际人口迁移的狂潮,其来势之猛、变化之剧、影响之广,与战后初期那一轮移民潮相比,均有过之而无不及。不久前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绪方贞子指出:“最近,跨越国境的人口流动成了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难民问题是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试金石。”^①这无疑是对当今国际移民态势的一个精辟概括。

从50年代到80年代的40年中,虽然也出现了种种新特点,但总的说来国际人口迁移的发展是相对平稳的,世界平均移民总数从大约80万人增至110万人,除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作为移民主要迁入国的地位进一步得到加强外,西欧和波斯湾地区成长为吸引外籍劳工的重要市场,^②而亚、非、拉一部分发展中国家则是移民包括外籍劳工的基本来源,这一态势直至80年代后半期仍没有大的变化。

表1 1985~1990年世界上10个迁入迁出移民最多的国家和地区

排序	移民迁入国	迁入人数(万)	排序	移民迁出国	迁出人数(万)
1	美国	290	1	墨西哥	75
2	澳大利亚	61	2	菲律宾	29
3	加拿大	37	3	黎巴嫩	28
4	沙特阿拉伯	33	4	中国	27
5	科特迪瓦	30	5	巴基斯坦	26
6	法国	11	6	印度	25
7	阿联酋	10	7	萨尔瓦多	21
8	香港	8	8	哥伦比亚	20
9	科威特	7	9	斯里兰卡	19
10	西德	5	10	韩国	18

资料来源:弗雷特·阿诺德:“世界人口迁移”,载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季刊《金融与发展》,1991年夏季号。

从80年代末叶至进入90年代,世界上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其中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海

① 日本《读卖新闻》1992年3月23日报道。

② 参阅拙文“当代国际永久性移民”,载《人口与经济》,1990年第4期。

湾战争和全球性经济萧条的影响尤为深远,国际人口迁移由此出现了几个引人注目的新特点。

移民和难民从东欧和前苏联大批涌出,西欧正在构筑移民壁垒

战后在“冷战”体制下,除民主德国累计净迁出约280万人外,东欧其他国家及前苏联国际人口迁移均相对沉寂,苏联迄1987年合计仅迁出82万人,罗马尼亚亦仅迁出50余万。而且这些移民中有不少是当局出于某种政治或经济上的考虑才作出安排的,如罗马尼亚在1967~1989年间有12万犹太人迁居以色列,罗政府从以方获得了6000万美元,而每一名日耳曼族人移居西德,罗政府更可获得人均1万美元的“人头费”。前总统齐奥塞斯库曾因此开玩笑说:“石油、犹太人和日耳曼人是我们最好的出口产品。”西方国家也一直以“让公民自由迁居国外”向苏联和东欧国家施加压力。

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和东欧国家发生剧变后,长期存在的对国际移民的限制不复存在,加上政治、经济形势急速恶化,引发了一股罕见的移民潮和难民潮。典型的如罗马尼亚,1989年12月22日前政权崩溃,仅隔半个月,新政府即于1990年1月8日宣布取消对公民出国旅行的限制,1年中发出移民护照150万份,实际迁出约80万人,40万犹太人差不多走光了,20多万日耳曼人大部分也走了,剩下一些老人连做饭都成问题,有关社团只好开办集体食堂。

苏联自1987年放松出国限制,随后3年移民数即超过前40年的总和。1991年5月20日酝酿已久的《公民出入境法》获得通过,“第一次给了苏联公民完全根据国际规则进行自由迁徙的权利”(内务部官员谈话)。据估计马上就打算出国定居的有200万人,正在考虑此种计划的为数更多达三倍。

东欧其他国家近年的移民也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1991年涌向意大利的阿尔巴尼亚难民,以及近一年多来涌向中欧各国的前南斯拉夫难民,其强度之大在历史上亦属少见。

对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人口大“血崩”,西方国家初则以喜,继则以忧,当它们多年来梦寐以求的事态演变终成现实后,很快就发现它们根本接受不了如潮水般涌来的移民和难民。如美国移民法第39款规定每年接受苏联移民不得超过5万人,且限于美国公民的亲属,相对于需求这无异是杯水车薪。西欧国家尤其是德国过去对来自东方的人口迁入一直持积极鼓励、热烈欢迎的态度。德国宪法规定境外的德裔都是德国人,都有权回国获取公民权,仅苏联此种人估计即达230万,罗、波、捷等国合计也有上百万,这些德裔中大部分都希望回到德国,因为就是找不到工作,救济金也相当于目前收入的2~3倍。但专家们认为德国的消化能力充其量仅约200万,显然也是粥少僧多。何况还有一个民族成份识别的问题,据现在领导“种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在欧洲增强问题调查委员会”的格林·福特形容:“每一个波兰人都在追逐能有一个德国祖母或祖父”。在前苏联,对日耳曼血统甚至已追溯到十七世纪彼得大帝时期。鉴于长时期的民族混居融合,要妥善解决这种问题显然是很棘手的。

对于那些挖空心思也与日耳曼血统搭不上界的人,想成为移民难于登月,只好退而求其次:“争取”当难民了。由于西德1949年颁布的“难民条例”规定,凡自称“政治避难”者西德将“自动收容”,并由政府负担生活费。其余西欧国家情况也基本相似。但过去因两大阵营之间的森严壁垒,想当难民实在不易,据统计,70年代要求西欧各国庇护的难民年均仅3万,80年代为4万,进入90年代一下子猛增十几倍,1991年达57万,其中德国独占25.6万,比1990年增长三分之一,1992年估计可能要再翻一番。难民来源除南、罗、波等东欧国家外,还包括阿富汗、伊拉克、伊朗等其他第三世界国家。据报道,1991年有近百万移民和难民拥挤在德国的旅馆、体育馆、集装箱船里,巴伐利亚州政府已动用纳粹达豪集中营旁边的营房。由于学校体育馆被占用,德国内政

部长朔依布勒说：“许多德国儿童已不再上体育课。”

应该看到，上述移民新浪潮是在西欧国家经济萧条、早已对日益增多的外国侨民啧有烦言的情势下出现的。以德、法为代表的西欧国家因经济需求从60年代开始大量从国外引入劳工，当第100万名劳工（来自希腊）来到时，西德政府曾赠以摩托车以示欢迎。70年代西欧外侨已超过1000万；至90年代初，包括非法移民在内，外侨总数已达到近2000万，约占西欧总人口的5%。^①这些人中的绝大部分，包括其在欧洲出生的子女，不管逗留年限多长，都很难入籍或取得永久居留权，^②各方面都饱受歧视，再加上种族、宗教及语言文化上的差异，外侨与本国人之间的不协调已日益明显（德国的清真寺已达1000多所，法国穆斯林的集中度还要更高）。当经济萧条、失业率居高不下时，外侨更成了本国人的出气筒。正是在这种形势下，从东方涌来了移民狂潮，其数量1年竟达一二百万之多，更一下子使矛盾急剧尖锐起来；还由于从1993年元月起欧共体内部人口和劳动力将完全自由流动，上述问题就变得愈加危急了。德国总理科尔1991年8月还在说“避难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到9月就要求修改“难民条例”，“把寻求避难的人当中那些真实目的在于寻找致富机会的人驱逐出去”。英国首相梅杰疾呼：“我们不能只是因为罗马、巴黎和伦敦比孟买和阿尔及尔更有吸引力而对所有要来的人开放”。法国“铁娘子”、前总理克勒松夫人更以罕见的强硬口吻要求“遣返那些无权呆在我们国土上的人”。“如果有10个移民需要送走，那就不应只送走3个人，5个人，而是10个人都送走”。^③

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背景下西欧种族主义日渐猖獗，1991年仅德国就发生袭击外国人事件2000多起，至1992年此类活动更是变本加厉，并发生了震惊世界的火烧难民营事件。一般民众是反对这种极端行为的，但其排外情绪确也有所增长。1992年6月法国政府的调查表明，70%的法国公民认为国内阿拉伯人太多，45%认为黑人太多，94%的人承认法国到处都有种族问题。在同月的英国民意测验中，79%的黑人、67%的白人和56%的亚洲移民都认为英国的种族主义很严重。上述排外情绪对选举已产生明显影响，近两年来反对移民的右翼政党在西欧许多国家中的得票率都大幅度上升。典型的如“自由奥地利人党”，其口号是“船已经装满了”，该党在维也纳市议会中的席位已由8席猛增至23席。法、德、意、比等国的右翼政党情况也很类似。

在民族矛盾加剧和移民大潮的冲击下，西欧各国都采取了紧缩入境签证、严格入境管理、遣返非法移民、加强警察合作、禁止雇佣黑工等一系列措施，1991年夏季仅两个多月德国警察在东部国境上就抓获近1万名企图非法入境的东欧人。连一向门户洞开、使外国难民“宾至如归”的芬兰，因不堪移民连同罪犯的大量涌入，已开始恢复入境签证，严格控制入境人数，并授权边境机关直接否决避难申请。德国议会经过激烈辩论终于在1992年12月6日决定修改宪法第16条有关避难权的内容，从此“难民”进入德国将受到极大的限制。这一切正如美国《时代》周刊评述欧洲移民形势的长文“从这儿出去！”所指出的：“西欧筑起了对抗难民和移民猛攻的壁垒。”（1991年第34期）。但这样做能否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是个不小的疑问。有的法国专家即指出，为防止非洲人一起涌来以致“空村”的方法之一恰恰在于让其中一些人来定居，因为他们平均每个人汇回去的钱可以养活30个人，^④这确是具有讽刺意味的。很明显，像现在这样的少数国家富裕，多数国家贫穷，且差距越拉越大的情况，对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确实是个不安定的

① 各国外国侨民比重(%)为：瑞士16.4，比利时8.6，德国7.8，法国7.3，奥地利6.3，瑞典6.0，荷兰4.0，英国3.1，丹麦2.7，希腊2.7，爱尔兰2.4，葡萄牙0.9，西班牙0.9，意大利0.7。

② 于沪生：“难认他乡是故乡”，载香港《紫荆》月刊，1992年第11期。

③ 转引自美国《时代》周刊1991年第34期综述：“从这儿出去！”

④ 法国《星期四事件》，1992年9月10日：“法国继美国之后也面临黑人问题。”

因素,仅仅靠筑起边界壁垒或施舍一些食品“援助”,恐怕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苏联东欧的移民除流向西欧外,迁往以色列、土耳其、南非以及南、北美洲的也不少。据统计,近几年苏联移民的流向中,以色列占44.7%,德国占41.8%,美国占6%,希腊占4%。罗马尼亚移民有三分之一以美国为首选迁入国。

以色列在80年代年均移民仅约2万人,90年代头两年则高达40万,除1991年5月通过“所罗门计划”从埃塞俄比亚运入1.4万犹太黑人外(付给埃政府3500万美元“人头费”),其余的移民基本上都来自前苏联以及东欧国家。这些新移民显著增强了以色列的国力(从苏联迁来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有5万人,跟随他们一道转移进来的专利达10万件),但因来势太猛,一下子确实难以消化,新移民的失业率竟高达40—50%,中央银行的官员也承认:“我们所有的困难都与移民有关。”但由于接受犹太移民是以色列的基本国策,再加上1992年8月美国给以100亿美元的移民建房信贷担保,移民潮一时是不会停止的,估计仅前苏联就还会有60万人将移入以色列。

来到土耳其的主要是保加利亚土族人。仅1992年6~9月即流入20万人,其中12万人滞留不归。过去土方对此类移民是持宽容甚至鼓励态度的,现在也感到吃不消了,1992年9月28日政府宣布对保加利亚土族人实行新的签证制度,实际上是关起了大门。

南非自1990年9月德克勒克上台后,调整了移民政策,把注意力更多地转向东欧,并大力展开宣传,仅几个月就从波、匈、捷等国吸纳了两万多移民。南美洲的阿根廷、乌拉圭、智利等国前几年人才外流,近年经济好转,已有意从前苏联东欧引入技术人才,阿总统梅内姆1992年初表示要吸收10万前苏联移民,后又增至30万。委内瑞拉、巴拉圭和玻利维亚据说对此也有兴趣。果能付诸实现,美洲移民史将增写新的一页。

波斯湾劳务市场萎缩,东亚成为吸引外籍劳工的新热点

从60年代到80年代初,由于石油开发带动了整个经济的腾飞,而原有人口数量及其劳动素养均不能满足需要,致使波斯湾地区崛起为具有世界意义的巨大劳务市场。1985年在海湾合作委员会的6个成员国(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巴林、卡塔尔、阿联酋、阿曼)中的外国侨民,即外籍劳工和他们的家属,已达720万人,占总人口43%,在科威特更占到72%。从劳动力看,这一比重还要更高,在卡塔尔和阿联酋,外籍劳工竟占了91%,科威特和卡塔尔也超过80%。这种现象在世界范围内也是罕见的。

在80年代中后期,由于石油收入减少,海湾地区经济增长失去了锐势,外籍劳工即趋于萎缩,但仍不失为世界上一个较重要的人口净迁入区。

海湾战争的爆发对该地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外籍劳工总数一下子减少了约200万人,其中沙特阿拉伯驱逐了100多万也门人,科威特的巴勒斯坦人亦由40万剧减至3万。战后由于经济形势的变化,以及对外侨过多会威胁国家安全、破坏生活方式的担心,海湾合作委员会六国已决定改变移民政策,减少对外籍劳工的依赖。如科威特计划通过有选择有控制地让一部分外侨入籍来增加科威特公民的数量,使之至少占总人口一半,并要求本国人包括妇女更多地参加工作。对外籍劳工则要求支付1000~2000美元购买工作许可证,只有月薪超过1500美元者才能携带家属,对其国籍也有所选择。一部分来自东欧的专业人员已取代了伊拉克人和巴勒斯坦人。^①但尽管发生了这些变化,海湾地区吸纳外籍劳工的因素并未完全消失,因此它今后仍将是一个有影响的国际劳务市场,当然,80年代初那样的兴旺景象可能是一去不复返了。

^① “科威特人纠正人口缺陷和外籍劳工问题”,载黎巴嫩《事件》周刊,1992年4月24日。

与波斯湾地区形成对照的是东亚劳务市场近年逐渐繁荣起来,日本、“四小龙”以及新登龙门的马来西亚都感到劳动力不足,原因就在于其经济发展迅速,且不断升级换代,整个社会环境亦随之发生了一系列深刻变化,如生育率下降,核心家庭增多,受教育年限延长,人们富裕后不愿再干脏、累、险的工作(在韩国称“三K工作”)。^①而南亚各国以及东南亚的菲律宾、印度尼西亚、越南等国生活水平低,人口压力重,对输出劳动力有迫切的愿望。这些是促使东亚劳务市场日渐繁荣的基本因素。

日本早已进入工业化以后,但与欧美国家相比,它仍具有相当浓厚的东方式封闭性,尽管劳动力供应长期偏紧,目前对每个求职者平均有1.46个空缺职位^②,但朝野上下对引入外籍劳工均持十分慎重的态度,唯恐单一大的民族的社会文化环境受到侵扰,而力图通过自动化解决一些问题。但事实上有些事机器是代替不了的,东京红灯区绝不会有哪位顾客愿意让机器人陪着饮酒,故近年在引入劳工上已有所松动,或者说当局已眼开眼闭。有人估计目前全国有外籍劳工50万人,官方则认为不超过20万。其中男工87%在建筑工地(工资仅为日本人三分之一),73%的女性成为女招待甚至妓女^③。1991年日本政府遣返了1.4万名外籍黑工,与总数比不过是小小零头,显然只是一种官方调控手段而已。为了两全其美地解决劳动力不足和保护民族文化的问题,1991年6月日本国会修改了法律,允许在国外出生的第一、二、三代日本血统的人回日本工作居留,给以不超过3年的签证,官方说这是为了让日侨更好地访问和了解故土,舆论则认为这是为进口廉价劳工提供合法途径。日本式的精明,于此又见一斑。

韩国过去曾是劳务输出大国。1988年奥运会前后外出的工人绝大部分陆续回国,近年反而成为劳工进口国,1992年外籍黑工即达14万人,比前一年增长了两倍。1992年6月政府首次受理非法逗留打工者的自我申报,标志着外籍劳工的引入将逐步由地下转为地上。

新加坡的外籍劳工占劳动人口15%。鉴于本国地狭人稠,官方对进一步引入外籍劳工持限制政策,而要求企业更多地从自动化和产业升级换代上找出路。但建筑业情况特殊,故政府的限制不得不一步步放松:1992年初只允许1个新加坡公民雇佣1.5个外籍劳工,年中放宽至1:3,年底又放宽至1:5。在这方面,市场机制显然比政府调控更为强有力。

香港尽管制造业已大量向外转移,而且前几年移民国外的人有不少回港就业,但劳动力仍然紧缺,1992年8350家公司申请输入9万劳动力,但工会方面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反对输入(1992年1月219个工会联合举行了反对输入劳工的大会),故实际核准者仅约半数。此外香港还大量输入菲律宾女佣,1977年为2400人,1992年已超过8万。

台湾对输入劳工的需求也很殷切(一半的企业认为发展的最大障碍是劳动力不足),当局目前估计全岛有非法劳工3万人,工会则认为已达9万人。其输入限制可望逐步放松。

马来西亚近年经济高速增长,外资滚滚流入,劳动力供应日趋紧张,许多种植园已面临后继无人或人去园空的危险。在此情况下,外籍劳工大量涌入,其数量有人估计已达150万之多,仅东马就有50万从印度尼西亚流入的非法打工者,1992年政府开始接受其申报,在6个月的大赦期内已有35万人取得合法地位。最近政府又宣布允许经过挑选的外籍劳工入境,在制造业和服务业工作。

向上述国家和地区输出劳工的主要是本地区内的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等,它们在政

^① “亚洲劳动力迁移发生变化”,载《日本经济新闻》,1992年10月5日。

^② 国际劳工组织:《1992年劳工报告》。

^③ “亚洲的剥削”,载英国《外事报道》,1992年10月1日。

治上和地理上都具有优势。泰国1989年输出劳工中西亚和东亚之比尚为2:1,1991年已扭转为1:2,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亚洲劳务市场重心的倾斜。此外,南亚国家在输出劳工时也越来越多把目光转向东亚。通过劳务输出,各国在经济上均获益匪浅,如菲律宾劳工1991年就汇回本国13.5亿美元,弥补了外贸赤字的四成以上。值得注意的是,越南正在成为一个很有潜力的廉价劳工输出来源。而人口总数远为庞大的中国,这方面仍相对沉寂,香港《远东经济评论》认为,这是由于“政府坚持垄断,还没有放开。”“一旦中国放宽或取消对劳工出口的限制,像台湾这样的小劳工市场将被吞没,连日本劳工市场也会摇晃起来。”但我们认为,“吞没”、“摇晃”一类的事态发展,恐怕是不会发生的,《远东经济评论》显然是过虑了。

美、加、澳向投资和智能型移民倾斜,对移民规模的控制渐趋严格

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多年来一直是世界上最主要的接受移民迁入的国家,进入90年代其移民政策也有明显变化,美国于1990年11月29日颁行的新移民法就是这一变化的集中体现。新移民法规定1992~1994年间年均接纳移民71.4万人(不包括难民),但从1995年起将降至67.5万。

与过去相比,美国新移民法的最显著的变化是新设了每年1万人的投资移民,规定其投资金额视地区不同应达50~300万美元,不包括本人和家属在内应雇佣10人以上。美国政府估计,未来5年投资移民将带来100亿美元的财富。但也有人认为,投资移民的设立是美国衰弱的一个标志。

新移民法还显著增加了智能型移民的配额,由过去每年接纳5.4万人增至14万人,其中教授、研究人员和跨国公司经理4万,高学位专业人员和有特殊技能者4万。此外,还为世界著名的运动员、艺术家和科学家等特设了O签证和P签证,其有效期都很长。

1990年普查表明,过去10年中美国总人口增长不到10%,而拉丁美洲裔却增长53%,亚洲裔更翻了一番,对美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例如拉丁美洲裔在人口数量上已接近黑人,不久就将成为美国第一大少数民族,而穆斯林的人数也已超过基督教中的圣公会教徒。这一态势引起了一些人的不安,1992年大选中有人即抨击布什政府,认为过去的移民政策“已对美国文化构成威胁”。在此形势下,新移民法向欧洲作出了特殊的倾斜,每年将增加大约4万张签证,还将通过抽彩的办法为之增加额外的机会。

对于偷渡来美的数以百万计的非法劳工,新移民法加强了限制,它规定雇佣外籍劳工时需向劳工部提出申请,且手续复杂,审批时间很长。由于美国的非法移民绝大部分来自拉美国家,特别是墨西哥,因此一直是美墨关系中的一个棘手问题。据墨西哥报纸报导,从1989年到1992年初,美国仅从得克萨斯州边界就驱逐了25.5万墨西哥劳工,在美墨界河中还打捞出许多墨西哥偷渡者的尸体,其中不少伤痕累累,引起了官方和舆论界的极大关注。在1992年8月美墨两国议会的联席会议上,墨方特别强调了对美移民问题,指出墨西哥在美移民和劳工的人权受到了侵犯。随着北美自由贸易区即将建立,上述问题如何得到公正合理的解决,无疑将对这一地区的稳定和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进入90年代经济状况一直不佳,移民都趋于减少。与美国相比,加拿大增设投资移民的时间更早,1986~1991年间此举共吸入15亿加元,创造了1万个职位,投资移民的90%来自香港和台湾。近两年来此类移民急骤减少,不少移民来加拿大住满3年取得永久居留权后又返回到香港等地,他们所要的实际上只是一纸护身符而已。澳大利亚因经济困难,失业严重,正逐步减小移民额度,1992年比1989年已减少两成以上,同时增大了其中技术人员的

比例。澳大利亚同美、加一样，对“难民”进入均持鼓励态度，但最近已宣布要采取严厉措施，来制裁那些自称“难民”其实只是利用澳大利亚移民制度达到自己目的的人，并自认为过去对他们太“心慈手软”了，澳移民决策委员会已提出报告，要取消前几年给予一批外国留学生的临时居留权。这些都说明，移民决不是一个单纯的人口问题，而是有着远为复杂的政治和经济背景。

世界难民潮此伏彼起，最终解决难民问题仍困难重重

因战乱和饥荒导致的大规模难民潮，一直是近几十年来国际社会中的热点问题。进入90年代，一些地区的难民问题已得到缓解，如阿富汗难民、柬埔寨难民、越南难民等，中美洲难民返回本国的已占到三分之二。但在另一些地区，又涌起了新的难民潮，其中影响较大的有：

1. 前南斯拉夫，因战乱产生的难民已达一二百万。

2. 非洲之角，长期陷于战乱和饥荒之中，国家之间的难民流动形成了“三角债”，如1991年9月埃塞俄比亚有索马里难民60万，苏丹难民1.5万，而后两国又分别有40万和5万埃塞俄比亚难民。进入1992年，非洲之角形势进一步恶化，流入肯尼亚的索马里难民已从5万激增增至25万。

3. 波斯湾地区，从1990年8月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到1991年1月中旬多国部队发动攻击前，从科、伊两国流出约80万难民。海湾战争后，伊拉克难民以更大数量涌出，3月27日在伊朗难民营的人数尚仅为5万，到5月19日竟暴增至137万，被称为“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40年历史上最快的难民移动”。

4. 缅甸，1992年初夏约25万穆斯林难民流入孟加拉国。

综览世界难民形势，可说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老帐未了，又添新账。目前世界难民总数仍高达1700余万。“冷战”的结束固然有利于缓解某些地区的难民问题，但过去受到“冷战”遏制的许多矛盾有所激化，又形成了一个产生难民的新热点。尤其是不少发展中国家因种种原因，生存条件每况愈下，这个问题如不能得到妥善解决，势必源源不断地产生出越来越多的新难民，从而给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前景蒙上阴影。一位联合国难民事务专家的话很值得引起人们注意，他说：“假如‘世界新秩序’这个词有什么意义的话，它必须意味着难民不再被视如草芥。他们的极度痛苦理应得到缓解和消除，为了道德和人权必须这样做，为了安全和我们自身的利益也必须这样做。如果那成百上千万人被迫离开的家园仍然无人居住，落在富裕世界头上的压力就将很快变得难以承受了。”^①

(作者工作单位：华东师范大学人口所)



^① 威廉·肖克罗斯：“大移民和世界的乡村”，载《难民》月刊，1992年第1期。